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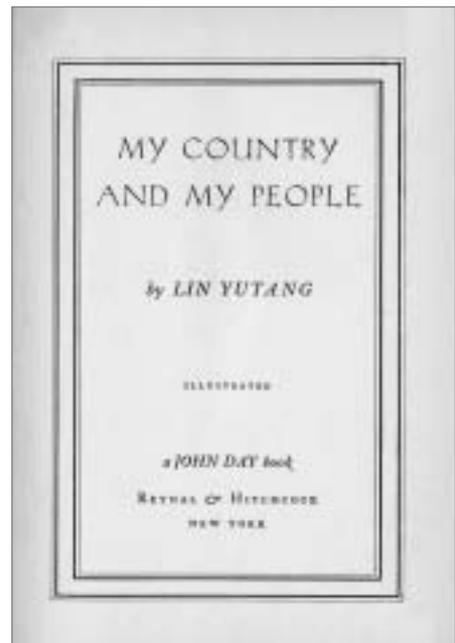
誰來解說中國？

● 錢鎖橋

現代中西文化關係是不平衡的。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，中國知識份子主要通過西化的策略來改造中國文化，使其獲得新生。中國知識份子基本上無暇、也無力來關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問題。西方早期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主要通過傳教士的著述。傳教士的使命是要把基督教文化傳播給中國，因而在解讀中國人民時居高臨下，當然在所難免。特別是十九世紀以後，西方殖民化已遍布全球，滲透中國。對中國的解讀當然構成其東方主義的一部分。

十九世紀以後，西方殖民化已遍布全球，滲透中國。對中國的解讀當然構成其東方主義的一部分。林語堂打破了這一局面。他向西方闡釋中國文化，並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力。

林語堂打破了這一局面。他向西方闡釋中國文化，並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力，整整影響了一代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，這在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中無人可比（辜鴻銘和胡適在這方面也有貢獻，但影響遠不及林語堂）。林語堂如何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？林語堂的闡述和傳教士的東方主義閱讀有何不同？林語堂在英語世界一炮打響，首先是靠其英文著述：*My Country and My People*（《吾國吾民》）。隨後的*The Importance of Living*（《生活的藝術》）進一步奠定了林語堂在英語世界的地位。本文借助有關歷史資料，以傳記形式，詳細考查林語堂創作、出版《吾國吾民》一書之跨文化背景及具體操作過程，並特別關注林氏和賽珍珠（Pearl S. Buck）／華爾希（Richard Walsh）的交往合作關係，以期用客觀歷史敘述來映照以上問題。



* 本文為作者所撰林語堂傳記專著之一節。

作為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中西化的典型人物，林語堂自然和在華西方人士多有接觸。林語堂不僅負責英文《中國評論》(*The China Critic*) 周刊「小評論」專欄，也是英文學術雜誌《天下》(*T'ien Hsia Monthly*) 的編輯之一，同時兼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秘書。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 (Bernard Shaw) 到上海短暫訪問，上海文壇盛情款待，林語堂成了迎賓主角。同年，上海文藝界還接待了一位特殊作家：剛剛獲得普立茲 (The Pulitzer Prize) 獎的賽珍珠。正是這次接待改變了林語堂以後的文學文化實踐方向。

賽珍珠是美國傳教士的女兒，從小在中國長大，對中國老百姓情有獨鍾。她雖然出生於傳教士家庭，但對傳教活動卻有看法。1931年她的小說《大地》(*The Good Earth*) 出版，立刻暢銷全美。一個成長於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後代寫了一部普通中國農人的故事，並獲得美國最高文學獎，這本是中西文化交往中的大事。賽珍珠的榮譽來自美國，但寫的是中國故事，她當然相當關注中國評論界對《大地》的評介。不過，《大地》在中國的遭遇卻較複雜，批評的較多，大部分論者在肯定之餘都有保留。其中最著名的批評者莫過於江亢虎，他以「中國學者」的身份用英文在《紐約時報》(*New York Times*) 刊文，抨擊賽珍珠對中國文化只是知之皮毛，用傳教士的眼光對中國捕風捉影，扭曲中國的形象。而林語堂則是賽珍珠堅定的支持者。

賽珍珠以《大地》一夜暴得大名後，1932年回美巡遊，於11月2日在紐約受邀發表演講，題為「海外傳教可行嗎？」(“Is There a Case for Foreign Missions?”)，批評整個基督教傳教事業，當然包括在華傳教士。其言語犀利直率，整篇演講後來刊登在《哈潑斯》雜誌(*Harper's Magazine*)，莊台公司(*The John Day Company*) 又印了單行本，這在美國、尤其在中國傳教士界掀起軒然大波，賽珍珠隨後宣布退出所屬的教會組織。

Herald Tribune 於1933年6月11日發表基恩 (Victor Keen) 一篇報導，題為〈中國作家讚揚賽珍珠的立場——林語堂博士，基督教牧師的兒子，稱之為「卓越貢獻」〉(“Chinese Writer Praises Stand of Pearl Buck — Dr. Lin Yutang, Son of Christian Pastor, Calls It ‘A Great Contribution’”)。據基恩的報導，林語堂特地發表聲明，聲援賽珍珠的行為，讚其文章「大膽誠實」，其對傳教及傳教士的批評是對基督教的重大貢獻，因為只有通過改革，基督教才会有希望。林語堂指出，在華傳教士好像仍是十六世紀的衛道士，自己沒甚麼教養，對中國人還充滿偏見，一邊給中國人傳教，一邊卻往往不以身作則，這樣在華傳教是沒甚麼希望的。該篇報導同時指出，林語堂在聲明中強調，有些中國評論家貶低賽珍珠對中國的了解和描述，林認為這很奇怪，因為賽珍珠對中國人描述生動活潑，相當準確。這篇報導可能是林語堂挺賽珍珠最早的記載。

1933年9月1日，林語堂在《論語》期刊發表〈白克夫人之偉大〉一文，對《大地》(當時譯為《福地》) 大加讚揚，稱「其在宣傳上大功，為使美國人打破一向對於華人的謬見，而開始明白華人亦係可以了解同情的同類，在人生途上，共嘗悲歡離合之滋味。」同時批評那些批評賽珍珠的中國文人心理不健全，缺乏自信心：「中國士大夫不知有此偉大勤儉之平民，乃成外強中乾虛張聲勢之局面，口喊打倒帝國主義，心願投胎白種父母。」^①

賽珍珠的小說《大地》在中國評論界批評的較多，大部分論者在肯定之餘都有保留。江亢虎抨擊賽珍珠對中國文化只是知之皮毛，用傳教士的眼光對中國捕風捉影，扭曲中國的形象。而林語堂則是賽珍珠堅定的支持者。

據斯諾 (Helen F. Snow) 夫人回憶，是他們夫婦首先通過其友人麥科馬斯 (Carol McComas) 把林語堂介紹給賽珍珠認識的^②。據賽珍珠自己回憶，她早就「小評論」的熱心讀者，與林語堂未謀面已先知其名，並頗為欣賞。1933年她在回上海途中還未登岸、在輪船上就收到一位美國女士的邀請，到上海後去她家赴晚宴，會見《中國評論》周刊的成員。賽珍珠欣然答應邀請，因為《中國評論》周刊的成員包括「小評論」專欄作家林語堂。據康 (Peter Conn) 記錄，賽珍珠於1933年10月2日抵達上海^③。《中國評論》周刊1933年10月12日發表賽珍珠〈新愛國主義〉(“The New Patriotism”)一文，編者註明這是10月4日歡迎賽珍珠晚宴上的演講，歡迎會由「星期三討論組」、筆會、現代文學研究會和《中國評論》周刊共同舉辦。當晚林語堂和賽珍珠第一次見面，並馬上邀請賽珍珠第二天到林家晚宴，其他客人只邀請了胡適。

華爾希來華一定和林語堂見過面，並敲定了出版《吾國吾民》的事宜。從此林語堂和華爾希／賽珍珠保持了相當親密的關係。在此期間，中美文化交流上演了一場「三人秀」，台上是賽珍珠和林語堂，台下是經理華爾希。

據賽珍珠稱，在第二天林家的晚宴上，席間林語堂和胡適交談並不太投機，胡適先走了。當晚林語堂告訴賽珍珠，他也想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書，讓西人了解一個真正的中國。其實，林語堂有此想法已有一段時間，在某種程度上是林語堂在上海的一些西方友人催促他寫這樣一本書，這些友人包括岡恩 (Selskar M. Gunn)、弗里茨 (Bernadine S. Fritz)、溫格恩—施特恩貝格 (Baroness Ungern-Sternberg)^④。賽珍珠馬上把這個消息告知莊台公司的老闆華爾希，希望他關注這位極有才華、極具潛力的中國作家。正是這個華爾希首先「發現」了賽珍珠，使賽珍珠一夜成名，同時也拯救了他自己初辦的小出版公司。

1933年年底，華爾希親自來到了中國。這次他到中國有兩個目的：一是追求賽珍珠(後來回美不久賽珍珠和華爾希各自離婚，重新結合，成為美國書商和作家美滿結合的典範)；二是發掘更多能用英文書寫中國的作家。1933年底、1934年初華爾希來華一定和林語堂見過面，並敲定了出版《吾國吾民》的事宜。從此一直到1953年，林語堂和華爾希／賽珍珠保持了相當親密的關係。在此期間，中美文化交流上演了一場「三人秀」，台上是賽珍珠和林語堂，台下是經理華爾希。華爾希不僅是精明的書商，也是一流的編輯，更是一位社會活動家，在紐約文化界、自由派知識份子中游刃有餘。他曾創辦《亞洲》(Asia) 期刊，成為美國介紹中國及亞洲的主要刊物，而莊台公司是美國30、40年代出版有關中國和亞洲書籍最有名的書局，賽珍珠和林語堂正是該公司最主要的兩個支柱。林語堂和華爾希的合作是全面的：從一本書題材的選擇、命名、封面設計、編輯、選擇出版時間、出版後的文宣等等，都有華爾希的參與。從1934到1953年，林語堂和華爾希有大量頻繁的通信往來，有時甚至每天都有^⑤。

林語堂和賽珍珠見面後不久，便為賽珍珠剛出版的《水滸》英譯本 (*All Men Are Brothers*) 寫了兩篇書評，一篇英文“*All Men Are Brothers*”發表於1934年1月4日《中國評論》周刊的「小評論」專欄，文中雖然指出譯文個別地方值得商榷，但總體來說認為賽珍珠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，「代表中國為西方世界獻了一份美妙的禮物。」1934年3月12日《人言》發表林語堂〈水滸西評〉一文，列舉西方評論界對賽珍珠《水滸》英譯本的好評，但在文章結尾林語堂筆鋒一轉，諷刺賽珍珠的中國評者：「愛國人士，應當趕緊罵白克夫人，因為她暴露中國之迷信。」

1934年春夏秋三季，林語堂的主要精力都在寫《吾國吾民》，期間夏天在廬山避暑山莊寫作，10月乃成。從橫向看，《吾國吾民》可以看成是《大地》的姊妹篇。賽珍珠最有名的批評者江亢虎曾指責《大地》專門描寫中國社會的下人，不能代表以儒家為主的中國文化。《吾國吾民》便以生動的筆調對中國文化各個方面進行闡述。從縱向看，《吾國吾民》也是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 (Arthur Smith) 的《中國人的特徵》(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) 和辜鴻銘的《中國人的精神》(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) 的一種回應。明恩溥的《中國人的特徵》在二十世紀初不僅在西方頗有影響，並通過日本的翻譯影響到現代中國知識份子，特別受到魯迅的強力推薦(目前已有三種中譯本)，後來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論調大多出自該書。但辜鴻銘認為明恩溥缺乏教養，書中充滿了一個倍感優越的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偏見，對此進行了辛辣諷刺。林語堂當然知曉此背景。

翻開《吾國吾民》一書，首先是賽珍珠寫的序(這幾乎成了一種模式，以後林語堂的書許多都由賽珍珠寫序)，再是作者自序，再有引言。讀這三部分很有意思，三個引文都在講一個問題：誰最有資格來閱讀中國、為西方讀者解釋中國？面對「中國」這樣一個「龐大而神秘的Dasein」，我們如何來解讀？靠誰來解讀？長期以來，西方讀者只是通過所謂的「中國通」來獲取有關中國的資訊。這些「中國通」可能是傳教士的兒子，也許是位探險家，或者是個記者，他們不懂中文，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裏，靠他們的廚子、傭人了解中國的資訊，一切都是以自己習慣的生活習俗和價值觀來評判中國人的言行舉止，這樣弄出來的「中國」太委屈了西方讀者。那麼，中國人自己就一定了解中國嗎？也不見得。自己身在其中，往往不知其所以然，而自身陷入太深，往往又有很大偏見。在作者自序中，林語堂特地把自己同所謂的「愛國者」區分開來，表明這本書不是為自詡的「愛國者」所寫，讀者應該比這些心胸狹隘的「愛國者」寬廣，中國文化多姿多采，也不需要「愛國者」來漂白處理。當然，林語堂聲明，他也不是為西方的「愛國者」而寫，這種人的讚賞他也受不起。

那到底誰最有資格來為西方闡述中國？林語堂的答案不是特別清楚，言語間有點閃爍。當然應該是中國人，現代中國人，能夠穿梭東西方文化，對中國能保持一定距離但又生活其中，具有常識理性，又有批判精神，對中國的愛來自幾千年的文化薰陶，而不是「愛國者」的感情用事。賽珍珠的序幫林語堂說得更清楚：唯林語堂莫屬。賽珍珠解釋道，西方人當然渴望從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筆下了解一個真正的中國，但問題是，最近幾十年以來，現代性侵襲中國，雖然中國大部分地方、大部分中國人仍然沿襲幾千年以來的生活方式，但知識精英、年輕人一下子都變成「現代」，他們說英語，追捧西方最新潮流，對中國現實完全脫節，都成了生活在中國的「外國人」，卻心理扭曲，自卑情緒嚴重，口口聲聲都是「愛國」，這種人怎麼能夠真正闡述中國呢？可是，能夠為西方闡述中國的，又只能是受過西方教育、能說英語的現代中國人，關鍵是：他在經歷「現代」以後還要是「中國人」，能夠重新回到中國文化，回到「舊的中國」，重新體會中國文化的精髓，洞察其幽默，欣賞其真善美，對自己的文化有足夠自信，因而坦誠客觀，無需遮掩羞澀。這種人太稀罕了。可賽珍珠一讀完該書稿，她便知道，這個人出現了。

到底誰最有資格來為西方闡述中國？當然應該是中國人，現代中國人，能夠穿梭東西方文化，對中國能保持一定距離但又生活其中，具有常識理性，又有批判精神，對中國的愛來自文化薰陶，而不是「愛國者」的感情用事。

《吾國吾民》於1935年由莊台公司出版，在美國一炮而紅，好評如潮。《紐約時報書評》(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)在1935年12月8日刊載肯尼迪(R. Emmet Kennedy)的〈東方向西方傾談——一位中國作家精彩闡釋本國古老文化〉(“The East Speaks to the West—A Chinese Writer's Fine Interpretation of His Country's Ancient Culture”)。文中寫道，中國文化古老悠久，而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卻如此年輕，他們還在孩童時期，一個文化保持了這種不可思議的長壽，可現在面對強加給他們的現代進步，卻又束手無策。西方文化崇尚征服、冒險精神，中國文化卻提倡耐力、消極抵抗。中國在物質上給世界貢獻了許多禮物，但其精神禮物卻沒人好好講過，讀林博士的書是一種極大的精神啟蒙，讓人認識中國「光榮而多樣的歷史」，而這樣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當下卻面臨崩潰的危險。林語堂不怕說真話，他說：中國人在政治上一塌糊塗，在社會上像個小孩，但在休閒養生上，他們棒極了。最後，該文作者寫道：我們以前可能會認為中國人陌生、怪怪的、神神道道、不可理喻，那是因為我們無緣交個中國人做知心朋友，讀完林博士的書，我們應該堅信中國一句老話：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

《紐約時報》代表美國上層知識界的看法。說《吾國吾民》在美國一炮打響獲得成功，首先是指其銷量，也就是說，《吾國吾民》贏得了廣大美國一般讀者的喜愛。林語堂應該收到很多讀者來信，可惜他沒有保存。莊台公司保留了一些，挺有意思。多數讀者稱讚《吾國吾民》是他們讀過所有有關中國的書中最棒的。有位讀者來信說他在中國住了二十來年，讀完此書後讓他久久不能平靜，忍不住拿起書來再讀一遍，讓他陷入久久沉思。還有一位華人讀者，很可能生長於美國，也嫁了美國人，來信聲稱自己既不是「真正的中國人」，但也沒有完全被同化，對中國還有一顆心，可對中國又一無所知。讀完該書後震動很大，為自己擁有如此燦爛的文化感到驕傲，中國文明不光發明了火藥和印刷術，而且在文化的各個方面：文學、建築、繪畫、藝術等等都絕不遜色於西方文化，可讀到中國的現狀又讓人痛心。她認為《吾國吾民》適合所有民族的讀者，英國人、美國人、拉丁人等等，特別是海外華人——他們可能既不是中國人，也不是美國人、英國人、拉丁人，但大多數關注的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藝術。有讀者來信詢問：書中提到的《三國》、《紅樓夢》、《金瓶梅》哪兒可以找到借來一讀？華爾希回覆：不好意思，還沒有英譯本呢。另一封引述如下：

林先生書中提到的李笠翁論楊柳一文，有沒有英文全譯啊？

現在沒有，但林先生準備翻譯編輯一本中華美文集，還沒決定是不是有這一篇。

一定要選這一篇啊，請告訴林先生一定要選這一篇，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懂樹會說話，美國人太需要這篇文章了。

當然，有很多人來信問中國人「吃的藝術」，甚至有問具體的菜譜如何如何。

《吾國吾民》在美國出版成功，可謂牆內開花牆外香。《吾國吾民》在中國基本沒有引起真正的討論，只有一些竊竊私語或流言蜚語。這倒不光是因為該書用英文寫成。林語堂最關注的還是會英文的中國知識界的回饋，而不太

《吾國吾民》在美國出版成功，但在中國基本沒有引起真正的討論，只有一些竊竊私語或流言蜚語。這倒不光是因為該書用英文寫成。林語堂最關注的還是會英文的中國知識界的回饋，而不太在乎所謂左翼文人的反應。

在乎所謂左翼文人(大多數不會英文)的反應。林語堂1937年2月23日在美國紐約寓所(50 Central Park West)寫了一封長信，回覆友人Yuwan(估計應該是簡又文)。現找不到Yuwan的原信，但從林語堂覆信中可以知道，Yuwan給林語堂寫了三頁長信，主要講他的朋友圈中對《吾國吾民》的種種非議，這些朋友來自IPR (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，太平洋關係研究會)，並和英文報刊*People's Tribune* (《國民新報》)有關。林語堂的回信闡述了八點意見^⑥。

一，國人對我的非議，主要來自受過西洋教育、會說英文、自我意識極為敏感脆弱的「愛國人士」，我不奇怪。他們就像鄉村的學童，被送到大都會洋場教會學堂上中學，卻特別害怕他的母親來訪，被別人看到。這些「愛國人士」甚麼時候可以成熟起來？二，有一種反應我沒料到，說我寫《吾國吾民》是「賣國賣民發大財」，我覺得說這種話的人無恥。他們腦袋裏怎麼就只有個人私利，他們怎麼就不能相信，有人可以對自己的民族與文化作一番誠懇深入的剖析和解讀？這種動機論指責太下賤。三，更重要的問題是，怎樣才算為中國作真實和明智的宣傳？西人又不是傻瓜，你把中國包裝成個大美人，完美無缺，誰信啊？我的態度是實話實說，着重強調中國是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，正從多年混戰和貧窮中慢慢地走出來。容不得對當下中國作任何批評，這種自卑心理要不得。四，假如你的「愛國」朋友擔心《吾國吾民》在海外給中國帶來不良形象，可以請他們放心，因為事實恰恰相反。其實我畫的中國也是個美人，不過臉上有個黑痣，西人卻懂得欣賞，不棄反愛。五，我寫此書不是為了給中國作政治宣傳。我要寫出中國的真善美醜，這是藝術創作。別老看那個痣，要看整體的美。六，我在書的最後一章坦誠寫出當下中國人的痛苦與悲哀，如果你的朋友在1934至1935年感覺不到廣大民眾的怨憤，要戰不能，要活不得，他們還算是「愛國者」嗎？這些人養尊處優，根本不體察民情。七，其實我也不在乎國人怎麼看我的書。我的書寫完了，讀者各種各樣，他們愛怎麼看便怎麼看。反正我有許多西方讀者告訴我他們讀了一遍又一遍。可惜的是，該書沒有引起國人好好反思。八，《中國新聞輿論史》是部歷史著述，我以歷史學家身份寫歷史，沒有遮掩漂白甚麼，假如你的IPR朋友不喜歡我描述當下中國新聞媒體的可悲狀況，我也只能說聲對不起。誠實啊，朋友，這是多麼討厭的東西！

信尾林語堂囑咐Yuwan不要發表此信，但印幾份發給他的朋友，希望他們閉嘴。

或許國人的擔憂也有點道理。1937年10月13日，莊台公司紐約辦公室進來一位客人山岡(G. Yamaoka)先生，他是日本商會主任。他來要求允許引用《吾國吾民》中兩段文字。這兩段文字用於一本小冊子，名叫《問與答》，由西雅圖日本商會和北美日本人協會發行。小冊子已經發行在用。這兩段引文是這樣的：

問：中國是世界上稅務最重的國家嗎？

答：「中國農人不需賣妻賣女來交稅……就讓他們做乞丐吧！」(《吾國吾民》，頁352)

問：中國官員和軍閥貪污嚴重，這種指控是真的嗎？

林語堂說，假如「愛國」朋友擔心《吾國吾民》在海外給中國帶來不良形象，可以請他們放心，因為事實恰恰相反。他畫的中國也是個美人，不過臉上有個黑痣，西人卻懂得欣賞。

答：「這樣的國家當然是瘋了……中國，作為一個民族，一定喪失了道德價值和是非觀念。」（《吾國吾民》，頁353）

華爾希第二天馬上給山岡回覆：很遺憾我們不能答應你們的引用要求。林博士保留起訴你們侵權的權利。如果你們現在即刻停止散發小冊子，林博士也就算了。

《吾國吾民》出版後，不斷重印，並且馬上被譯成多種語言。1937年12月3日，德譯本出版商致信莊台公司^⑦：

我們準備明年春季出版《吾國吾民》德譯本，但我們想請林語堂允許我們做些刪節。我們發現書中多處地方林語堂作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負面評論，這會得罪德國的領袖們，我們覺得這也不是林語堂的本意。我們認為林語堂的觀點從正面表達已經很清楚了，無需這些負面評論。這些刪節一共不會超過幾頁。假如林語堂不同意這些刪節，請他按照他的觀點逐條說明反對的理由，但最後他必須說明儘管有這些理由，他還是同意這些刪節。

華爾希12月21日回覆道：林博士已讀過你的來信。他當然不想傷害德國讀者的善意，因此他同意刪節。書中有些說法如果被認為是對德國國家政策的直接批評，可以被刪。但他希望他批評德國哲學家「最為虛浮」不要刪。

註釋

- ① 林語堂：〈白克夫人之偉大〉，《論語》，第24期（1933年9月1日），頁880-81。
- ② Helen F. Snow, *My China Years: A Memoir* (London: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, 1984), 121.
- ③ Peter Conn, *Pearl S. Buck: A Cultural Biography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6), 159.
- ④ 見Lin Yutang, preface to *My Country and My People* (New York: John Day, 1935), xiv。
- ⑤ 林語堂和華爾希的大量通信現存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，不過只限於1941至1953年。1941年10月20日華爾希曾寫一封信給林語堂，談及準備編一本他和林語堂的通信集，稱作*Letters of an Author: To His Publisher and Others*，以展示一個作家成名的過程，並以此為基礎，今後為林語堂寫一本傳記。這件事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，在1948年11月8日華爾希給林語堂的一封信中，華爾希還說他有空就在看他們的通信，已看到1937年底，但還沒決定該書以何種形式出版。該書一直沒有出版，但很可能為了準備該書，華爾希後來一直看到1941年，並把這些通信專門拿出來放在別處。我現在無法找到這些資料（也不知是否還存在），因而無從描述林語堂和華爾希初期合作的具體細節。
- ⑥ 該信件為手稿，藏於台北林語堂紀念館。以下為信件內容概述。
- ⑦ 德譯本出版商致莊台公司信，1937年12月3日，「莊台公司檔案」，收藏於普林斯頓大學。

錢鎖橋 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，現於香港城市大學任教。編著有《林語堂雙語小品文集》。